《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42期 2018年6月,頁73-125 ▲研究紀要 doi:10.6255/JWGS.201806 (42).03

養育「無污染」的孩子: 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密集母職」是當代社會母職實作的重要特徵,除了主張媽媽是孩子最佳的 照顧者外,更強調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心力,甚至金錢,專注於育兒。在新自 由主義脈絡下,社會認爲獨立的個人要爲自己的身心福祉和成敗負責。對於不被 視爲獨立人的孩子,則由母親爲他們擔負趨吉避凶、管理風險的責任。本文探 究,在近年來有機論述盛行的影響下,「食物工作」如何成爲重要的母職實作場 域,並再製性別與階級的不平等。

藉由訪談中產階級母親,本文呈現有機論述、風險管理的概念及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影響與形塑她們為孩子準備食物的日常實作。首先,透過有機食物的選擇、購買與烹調,她們進行孩子日常生活的風險管理,降低孩子被「污染」的機率;其次,食物準備成為她們實踐母職與建立認同的重要場域;接著,藉由有機飲食,這群媽媽展現個人對於守護環境與孩子未來的責任,但同時強化新自由主義對個人理性的強調。一方面,因為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這群中產階級媽媽擁有較大選擇與決定的自由;另一方面,她們的母職實作仍受到傳統性別體制影響,追求有機食物與風險概念更強化日常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

關鍵詞:有機食物、風險管理、母職、性別、階級、食物工作

收稿日期: 2017年12月6日;接受日期: 2018年5月16日。

一、前言

受到西方營養科學的影響,台灣社會普遍認為飲食與健康有密切關係,此原則也適用於成長中的兒童。從政府政策、專家知識到生活常識皆指出飲食對兒童健康的影響,同時發展出針對不同年齡階段孩子的日常飲食指引,作為實作標準。1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現代國家藉由監控、常規化與自我規訓的過程,進行對個人的治理,健康被視為個人或個別家庭的責任(Coveney, 1998)。在此脈絡下,家庭成為守護與促進兒童健康的重要場域,因傳統性別分工的規範,大多由母親負責主要的食物工作(foodwork),包括計畫與監管孩子的飲食內容,以及一系列採買、準備、烹調、用餐和情緒管理等過程(Valentine, 1999)。既有研究指出,食物工作高度性別化,餵養家庭(feeding the family)的過程反映並再製社會的性別秩序,包括文化價值所重視的母職實踐與女性氣質(DeVault, 1991)。

密集母職(Hays, 1996)是當代育兒照顧的重要特徵,要求媽媽們投入高度的體力與情感勞動,甚至是經濟資源,以發展、提升孩子的潛能。Joslyn Brenton (2017)以密集餵養的意識形態(intensive feeding ideology)描繪受到密集母職影響,社會普遍認為母親必須參

致謝詞:謝謝受訪的媽媽們,妳們的信念和堅持,開拓母職實踐的可能,是愛的體現,也可以是改變社會的起點。本文曾發表於2017年「台灣社會學學會年會」,修改過程受益於評論人胡郁盈及與會者巫麗雪的建議。孔祥明和蔡晏霖透過信件往返給予重要回饋,特別是蔡晏霖從倫理觀點提醒將食物工作簡化為階級批判的危險。此外,謝謝三位期刊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讓本文的分析論證能再往前推進;並感謝主編吳嘉苓在過程中的鼓勵,以及編輯助理張峻臺和楊雅婷的細心協助。

¹ 參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https://obesity.hpa.gov.tw/TC/downloadList.aspx?pn=2&cid=80

照專家的建議,積極投入密集的食物勞動(food labor),管理孩子的飲食內容,培養其健康的飲食習慣,並降低他們可能遭遇的危害與風險。

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Ulrich Beck(1992)主張,傳統社會命運(fate)的概念,已不再能為風險提供解釋,取而代之的是科學、政治、資本與市場的力量,以及個人面對日益增加的風險所須負擔的責任。在風險概念與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育兒實作逐漸成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拓邊的工程。對於不被視為獨立人的孩子,母親要承擔為子女管理風險的責任與壓力;「勝任」的母親同時也是稱職的風險管理者,藉由個人的選擇和決定,她們能避免或減少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危險(Lee, 2008)。「餵養」是育兒照顧的重要日常活動,母親的食物工作因而受到高度要求與檢視;「好媽媽」要能持續地研判並選擇有益孩子成長與發展的食物,這些行為被視為母愛的展現,養育健康的孩子則成為母職成就的重要象徵(Cairns, Johnston, and MacKendrick, 2013; Cairns and Johnston, 2105; Wright, Maher, and Tanner, 2015)。

社會經濟變遷、生活型態改變,加上近年發生數起食品安全危機,台灣社會有機市場的通路逐漸擴張,成為新興健康飲食的選擇與安排(黃紫翎,2010;邱元儂,2013)。本文探究,在食品安全與有機論述盛行的影響下,「食物工作」如何成為重要的母職實作場域?相關論述如何影響媽媽們的日常消費習慣與食物工作?她們如何辨認、定義與管理影響兒童健康和發展的風險?以及,她們如何透過食物工作,協商與建立母職認同?既有研究指出,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不同社會階級的媽媽的生命經驗(Elliott, Powell, and Brenton, 2015),但對擁有較多經濟與文化資本的中產階級和中上階

級媽媽的影響,最為深刻(Reich, 2014)。因此,本文以中產階級母親為研究參與對象,藉由訪談,呈現有機論述、風險管理的概念以及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與形塑她們為孩子準備食物的日常實作。首先,透過安全食物的選擇、購買與烹調,她們進行孩子日常生活的風險管理,降低孩子被「污染」的機率;其次,食物準備成為她們協商、展現母職認同的重要媒介;接著,這群媽媽藉由有機飲食和日常食物工作,實踐守護孩子未來與環境的信念,但同時也強化新自由主義對於個人責任的強調。最後在結論中,我討論社會階級與性別的交織,如何形塑這群媽媽的日常經驗:一方面,因為階級資源,她們擁有較大選擇與決定的自由度;另一方面,這群媽媽多以「個人選擇」的語彙,描述母職實作與食物工作的安排,少數從倫理觀點,強調重建人和土地的連結。然其母職經驗仍受到傳統性別體制的影響,追求有機食物與風險管理的概念更加強化日常育兒分工的性別不平等。

二、文獻回顧:密集母職、風險管理與食物工作

文獻回顧包括兩部分:密集母職以及風險管理、母職與食物工作。在新自由主義理性(neo-liberal rationality)的脈絡下,密集母職意識形態與風險管理的概念,強調媽媽應為孩子的健康與福祉負責。媽媽們藉由日常的食物工作,一方面監管孩子的飲食攝取,另一方面回應常規化(normative)的母職標準,並評價自己的母職表現。

(一) 密集母職

社會學家 Sharon Hays (1996: 8)提出「密集母職」概念,描繪高度性別化的育兒模式,除了主張媽媽是最佳的照顧者,肩負孩子福祉的責任,更強調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心力,甚至金錢,並在專家論述指導下,進行育兒相關活動。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反映,當代社會將孩童視為脆弱、天真的,極有可能遭遇難以估算的危險,這樣的預設合理化育兒過程中投資的時間與金錢,以及各種介入(Katz, 2008)。

近年,相關研究呼應 Hays 的觀察,以密集親職或過度親職(hyper-parenting)指稱以孩子為中心的照顧,是項需要龐大時間與情感涉入的育兒工程(Honoré, 2010; Rosenfeld and Wise, 2010)。社會發展出一套密集母職期待(intensive mothering expectations),規範母親必須遵循特定的育兒價值與照顧實作;同時,母親面對孩子的行為表現,被期許要負擔的責任面向日增(Johnston and Swanson, 2006)。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影響,育兒的標準變得單一而缺乏彈性,母職被分為「好」與「壞」,照顧的方式不再只呈現個別差異,而隱含優劣階序的判斷。符合密集母職標準與期待的,能被肯認為「好媽媽」;反之則容易被貼上「壞媽媽」或「不負責任母親」的標籤(Dillaway and Paré, 2008; Liss, Schiffrin, and Rizzo, 2013)。因此,育兒的日常實作不僅支持、滿足孩子的生理、心理與情感需求,更成為展現母職道德價值的場域。

密集母職的概念雖源自對西方社會白人中產階級母職實作的觀察 (Hays, 1996; Roberts, 1997),但既往研究指出,不同社會階級、種族 /族群身分的母親,多少必須承受服膺密集母職期待與標準的壓力 (王儷靜、陳雯玲,2007;唐文慧,2011;鄭忍嬌、周麗端,2013;藍佩嘉,2014;洪惠芬,2015;McCormack,2005;Bowen,Elliott, and Brenton, 2014;Elliott et al., 2015;Henderson, Harmon, and Newman,2016)。密集母職儼然成為當代母職實作的重要特徵,同時也強化中產階級的價值,作為母職實作的常規。相關研究發現,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不僅形塑媽媽們的育兒觀念與實作,也成為她們用以評價自己母職表現的參照;無法符合密集母職期待的女性,往往會產生壓力、焦慮、挫敗感等負面情緒,甚至自我責備與懷疑,並進一步否定自己的母職認同(Medina and Magnuson, 2009; Crowley, 2014)。不過,晚近的研究開始關注女人在實踐母職過程中的能動性,一方面,密集母職限制並形塑女人的母職實作與認同;另一方面,作為行動的主體,女人仍然具備協商、挑戰,甚至翻轉密集母職期待的能動性(Johnston and Swanson, 2006; Christopher, 2012)。

當代台灣社會的母職實作,也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藍佩嘉(2014)分析台灣社會的親職教養文本,發現晚近的教養論述往往以中產階級家庭、專職母親為預設,相較於上一世代,現代父母花較多的時間和金錢與小孩相處或投資子女,尤其母親更為積極。潘淑滿(2005)指出以孩子為中心的母職實作與安排,唐文慧(2011)探究中產階級媽媽離職決定的多重因素,其中包括密集母職期待的影響。洪惠芬(2015)訪談參與勞動市場的母親,發現受到密集母職影響,她們在工作與家庭間的輪班處境更加艱辛。這些本土研究呈現密集母職如何形塑當代台灣女性的母職實踐,對中產階級影響更為深刻。延續本土研究的發現,我以食物工作為例,闡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到媽媽們的日常實作,母職不再只是個人選擇,更受到制度形塑;母職不僅是愛的展現,也是壓迫的體現。

(二) 風險管理、母職與食物工作

新自由主義源自 1980 年代後,受到全球化與經濟轉型影響,西方國家開始採取去管制措施,包括私有化、自由化,並提倡減少政府干預,以追求最大的經濟發展與利益(Harvey, 2007)。往後數十年間,新自由主義逐漸取得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地位,在著重風險管理的脈絡下,強調個人責任與自我管理的重要性(Phoenix, 2004)。台灣因與西方福利國家發展路徑不同,學術社群對於使用新自由主義的語言仍有爭議(徐進鈺,2014)。黃應貴(2014)指出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發展,除了去管制化、金融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外,也展現在日常生活各層面。晚近的本土研究討論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福利政策(周怡君,2012)、教育體系(蘇碩斌,2012)和公共健康政策(盧孶艷、陳海焦,2007)的影響。盧孶艷和陳海焦(2007)以更年期婦女骨質疏鬆篩檢為例,論述維護健康如何成為個人的道德責任。上述研究顯示,新自由主義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僅在政府政策,也滲透日常生活的層面,特別是對個人理性與道德責任的強調。

現代社會中,風險是重要的概念,日常生活充斥各種不確定性與危險,取代傳統社會的可預測性,個人被期待要發展與具備理解、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能力(Beck, 1992)。然而,風險的概念受到社會編派與建制關係所形塑,何謂風險、何能成為風險並不總是理性計算的結果,更多的時候,風險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反映特定社會、文化脈絡賦予的社會性意義(Kasperson and Kasperson, 2005)。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風險管理成為私有化、個人的責任,更進一步淡化公共介入的重要性。

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強調專家指引作為育兒的重要參照(Hays, 1996: 8),以抽象化的知識取代親子互動的真實,也將母親預設為不勝任的風險管理者,需要依賴專家指導育兒過程的實作環節與安排。對於專家權威的信仰,不僅加重母親的育兒焦慮、壓力與低自信心,同時強化育兒為個別的責任,提升母親(育兒)能力可為孩子趨吉避凶、降低風險,並確保未來的發展。

近來有越來越多研究關注母親的食物工作,食物工作不僅成為女性特質展演的場域(Charles and Kerr, 1988),也被用以衡量母職的表現(陳毓幃,2012;DeVault, 1991; Cairns and Johnston, 2015)。在風險社會的脈絡下,兒童的健康被視為母親的責任(Lupton, 2013;MacKendrick, 2014),媽媽們的餵養工作日漸受到嚴密監管,包括是否遵循專家建議與營養科學指引,是否採買健康、安全與有機的食物,是否與孩子協商其食物偏好並協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Brenton(2017)以密集餵養的概念描述這一連串活動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影響,母親們高度參與食物工作的準備過程,顯示「好媽媽」不僅是充滿愛與關心、負責任的照顧者,同時也是孩子健康的守護者。

在西方及台灣社會,食物選擇和攝取被視為與健康身體和疾病預防息息相關(Keane, 1997)。隨著支配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從自由主義轉為新自由主義,我們不再主張國家與專家應負擔照顧個別公民的責任,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要透過理性的計算與選擇,為自己健康負責的道德信念(Petersen, 1997)。然而,兒童不被認為是具備完全理性、能夠管理自己健康的行動主體(Lotz, 2004),因此父母,通常是母親要負責監督孩子的飲食習慣與體重控制(Jackson and Mannix, 2004; Maher, Fraser, and Wright, 2010)。

過去幾十年間,兒童肥胖是已發展國家必須面臨的重大健康議 題,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兒童肥胖的盛行。受到傳統性別體制影響, 從國家健康政策到大眾媒體論述,皆視母親為兒童身體的管理者,兒 童肥胖為母親的個人責任 (Maher et al., 2010; Zivkovic, Warin, Davies, and Moore, 2010)。將兒童病理化的肥胖研究,把原因咎責於母親缺 乏相關的健康與食物知識,尤以勞工階級的媽媽為然(Topham, Page, Hubbs-Tait, and Rutledge, 2010; Burrows, 2011),中產階級的母親則因 為有薪工作擠壓時間,以外食取代在家用餐,也被視為造成兒童肥 胖的原因之一(Rhee, 2008)。另一類研究則探究兒童作為純淨、自 然的象徵,母親如何藉由食物工作守護他們的無污染(Cairns et al., 2013)。例如 Kate Cairns 等人(2013) 透過質性訪談,呈現「有機孩 童」(organic child)的意象如何影響媽媽們的食物工作,以及她們認 為保護孩子免於污染是自己的責任。其研究也指出,相較於中產階級 的母親,勞工階級的媽媽雖受到有機論述影響,但因經濟與文化資本 的限制,不僅在實踐上較為困難,也較容易責難自己是不合格的媽 媽。

討論食物工作與母職的研究,呈現不同社會階級的母親在經驗實作上的差異性:中產階級的母親較嚴密地管理與監控孩子的飲食行為,大多會為自己無法使孩子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而焦慮或自責;勞工階級的媽媽則較仰賴外部的專家,例如公衛護士的建議,較少透過與他人比較來評價自己(Wills, Backett-Milburn, Roberts, and Lawton, 2011; Wright et al., 2015)。Jane Wright 等人(2015)挑戰主流的公衛研究將兒童肥胖歸咎於勞工階級媽媽疏於照顧孩子,他們的研究發現,勞工階級的母親也強調對孩子的責任,但因經濟與文化資本的限制,選擇較少,她們考量的往往是孩子當下的福祉,而不像中產

階級母親強調藉由投資「現在」守護孩子的「未來」(Wills, Backett-Milburn, Gregory, and Lawton, 2008; Backett-Milburn, Wills, Roberts, and Lawton, 2010)。Cairns等人(2013)有類似的發現:勞工階級的母親雖受到有機論述影響,但物質條件造成其日常實作的困難。不過,和 Wright 等人的研究不同,Cairns等人發現勞工階級的媽媽較易因無法達到主流社會期待的常規標準而自責。

社會階級、食物工作與母職之間的關係與交互作用是複雜且動態的,無法僅以二元框架區分階級的差異(Wills et al., 2011; Wright et al., 2015)。階級影響個人能運用的資源和做決定的自由度,但結構限制下,個人仍可展現行動的能動性。食物工作不只是母親的日常責任,她們也藉此回應、協商或抗拒社會對於母職的期待與標準。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為探究媽媽們的育兒實作,及其如何理解與詮釋自身的經驗,本研究以質性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方法。本文所使用的資料,為一項持續中的計畫之部分。2該計畫檢視母職的社會關係與編派,如何形塑不同階級、族群媽媽們的日常育兒與教養經驗,而本文僅聚焦於中產階級母親的食物工作與母職實踐。研究對「有機食物」的界定,並非採用農業與衛生主管機關的官方定義,而是研究參與對象認為自身具備有機食物的概念,重視孩子的營養攝取,同時,在採買食材時會優先選擇符合有機、安全的管道。

² 本計畫最早開始於 2014 年,我成為母親後,對母職感到好奇與興趣,最初未申請任何經費,之後則以新住民女性的母職為主題,獲科技部補助 (105-2410-H-010-005-MY2)。持續中的研究計畫,涵蓋不同階級、族群女性的母職經驗。

研究參與對象的招募,採取立意取樣,主要透過兩大特定社群,以及我自身的人際網絡介紹。這兩個社群包括倡議環境與食物安全的「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以及某一具有類似信念的實驗性學校系統,以下簡稱精靈學校。基於婦女在家庭內的政治自覺及生態消費的興起,台灣第一個結合婦女與環境議題的運動組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於 1989 年成立。 3 2001 年成立「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強調用消費改變世界,以實踐綠色生活和環境永續為宗旨。 4 精靈學校則是在台灣實驗教育蓬勃發展下的體制外學校,該校的教育具備一套完整的兒童發展哲學,主張孩子身體與心智發展的階段性,也在相同的哲學觀下,建立自己的醫學、農法與建築等系統。精靈學校的教育強調身心靈的全人(holistic)觀點,有機和天然食材也是保護身心靈的一環。

本文的訪談資料來自 20 位研究參與對象(參見表一),年齡涵蓋 32 歲至 47 歲,育有就讀小學或幼兒園的孩子,子女數介於 1 至 3 人之間。她們在生育前皆從事專業性的工作,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包括碩士與博士,9 位因育兒與家庭因素選擇離開職場,5 位轉為部分工時或協助配偶的事業,其餘 6 位仍為全職工作者。她們的配偶皆為全職工作者,多數從事醫療保健、會計金融、公關廣告、科技等專業工作,少數為在家接案的工作型態。簡言之,她們為擁有豐富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的中產階級媽媽。訪談進行的當時,她們的居住安排全數為核心家庭,沒有與原生家庭的父母或公婆同住,但其中靜敏與爸媽住在同一大樓社區,淑怡和真美則分別和爸媽、公婆住在走

³ 參見〈台灣環保「雞婆」——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1989-)〉, 《台灣女人》。網址: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13_40051.html

⁴ 參見「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網站:http://www.hucc-coop.tw/about-us

路可及的距離。

訪談時間從 1.5 至 3 小時不等,地點包括研究參與對象家中、工作場所,以及受訪者孩子就讀學校附近的小店或咖啡館。為了解食品安全與有機食物論述如何影響媽媽們的食物工作及其對兒童健康的想法,訪談聚焦於食物工作的流程與細節,包括如何規劃孩子的飲食,實際的採買、準備與烹調工作,以及她們對於系列工作賦予的意義和詮釋。徵求受訪者同意後,所有的訪談皆錄音並謄打為逐字稿,供後續資料分析與發展概念性主題。文中提及受訪者時,皆以匿名呈現,在不影響資料分析的原則下,略更動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確保受訪者的身分不會被辨認出。

六年前,經歷懷孕、迎接小孩誕生的過程,我成為媽媽。這不僅改變了我的身分認同,也影響我認識世界的視角。回到本文研究的主題,我和研究參與對象共享相似的社會位置與經驗,包括中產階級、媽媽、消費合作社社員,以及我的孩子也就讀精靈學校。不同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典範認為個人的主觀經驗會造成研究的偏誤,我承襲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立場,認為個人的經驗與生命傳記,不僅具備反映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的政治性,同時,藉由反思性(reflexivity),個人傳記能成為研究分析、洞察社會生活的養分與基礎(Cook and Fonow, 1986; Fonow and Cook, 1991)。因此,我在發展分析概念時也參照自己的母職經驗,進一步比較研究參與對象與我的經驗異同,並連結結構限制與個人的日常實作。誠如 Julia Twigg(2004: 62)所指出的:「個人的掙扎與經驗,提供學術理論化的重要基石。」藉由這樣的分析策略,我也想要呈現個人知識與經驗對學術研究可以產生的貢獻與價值。5

⁵ 同時我也認為,不具備反身性的個人經驗,確實有可能在發問、設計、資料蒐

表一:研究參與對象基本資料

姓名	學歷	訪談時職業 (先前職業)	先生職業	所屬社群
彥蓉	大學	專職媽媽 (服務業)	醫療專業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文芳	碩士	專職媽媽 (公關公司)	金融業	精靈學校
月青	碩士	兼職醫療專業 (專職醫療專業)	醫療專業	精靈學校
詩雅	博士	大學教職	建築業	精靈學校
靜敏	博士	大學教職	科技業	主婦聯盟
佩華	碩士	協助先生經營公司	自營公司	精靈學校
淑怡	碩士	出版業	研究單位	主婦聯盟
嘉佳	大學	協助先生經營公司	自營公司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國英	碩士	兼職會計師	自營公司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書琴	碩士	專職媽媽 (銀行業)	銀行主管	精靈學校
琇雅	碩士	中學教職	接案工作者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怡如	碩士	專職媽媽 (保險公司主管)	科技業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雅雯	大學	醫療保健業	接案工作者	精靈學校
瑛如	大學	專職媽媽 (心理諮商)	科技業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真美	碩士	兼職接案翻譯工作	大學教職	主婦聯盟
金鳳	大學	中學教職	中學教職	主婦聯盟

集、分析與書寫上,成為研究的妨礙。感謝審查委員提醒,在分析與詮釋資料 時,「局內人」的經驗確實應置入括弧中(bracketing);身為研究者,應反思 結構、制度、論述與個人經驗和實作間的交互關係。

姓名	學歷	訪談時職業 (先前職業)	先生職業	所屬社群
欣霖	大學	專職媽媽 (廣告業)	科技業	精靈學校
碧芬	大學	專職媽媽 (中學教師)	醫療專業	主婦聯盟
予恩	碩士	專職媽媽 (金融業)	金融業	精靈學校
昱梅	大學	專職媽媽 (醫療保健)	科技業	精靈學校/主婦聯盟

四、研究發現與討論

研究發現包括三部分,首先,我描繪受到營養科學與有機飲食論述的影響,受訪的中產階級媽媽們,如何藉由例行的食物工作,管理孩子已知和未知的風險;其次,透過媽媽們的敘事,我闡述食物工作成為她們競逐母職認同的場域,以及過程中如何協商、管理與伴侶和重要家人的衝突;最後,我指出這群受訪的媽媽將食物工作視為教育孩子的過程,協助孩子建立正確飲食習慣的同時,她們認為自己守護了孩子與環境的未來。但她們的母職實踐,同時強化了個人責任與選擇的重要性。

(一)「食物工作」成為日常生活風險管理的場域

食物工作,對所有研究參與對象而言,不只是滿足小孩生理需求 的例行活動,更是母職實作與建立認同的重要場域。密集母職與風險 管理的概念中介她們對食物的選擇、採買、給予的時間點、烹調方式 等。這群媽媽皆能指出飲食對孩子健康和身心發展的重要,以及可能 浩成的風險,同時,她們投入大量的勞動、心力、情緒工作和時間淮 行日堂的食物工作。

受訪者多半談到,成為母親後,如何逐漸意識到自己肩負孩子 福祉的責任,包括飲食這件日常活動對孩子造成的影響。結婚前,彥 蓉從事醫療專業相關工作,懷孕時因身體不適而離開職場,孩子出生 後,她選擇成為全職媽媽。彥蓉回憶準備孩子副食品時戰戰兢兢的心 情:

那是孩子的第一口食物,對我或對他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我相信 孩子最開始接觸到的食物、吃東西的習慣,會影響他一輩子。在 他還小的時候,應該讓他多接觸不同的食物,養成吃東西的好習 慣。他吃副食品一段時間後,每一餐我都盡量混合不同種類的食 物,但還是會考量搭配起來的味道.....。我沒有給他吃含麩質的 食物,小麥製品是很多疾病的根源,也盡量避開「涼」或「冷」 性的食物,我家小孩腸胃不好,冷的食物會讓他容易拉肚子。

對於彥蓉和其他很多受訪者而言,為孩子準備食物所需的不只是在廚 房進備、料理的時間,還包含之前的觀察、研究、計畫與鎮密思考等 等。育有二子的文芳分享,為孩子準備副食品的過程,需要身體與心 力的勞動:

在小孩吃副食品之前,我看了很多書,包括什麼時候開始吃副食 品,有六個月和四個月不同的說法,以及要從哪樣食物開始。我 後來折衷在小孩四個多月時,開始讓他嘗試,第一口吃的是十倍 粥,就是米和水的比例是一比十。我會觀察孩子吃的情況,再慢慢減少水的比例,等他米糊吃得比較好之後,再開始吃蘋果泥。 (研究者:為什麼是蘋果?)蘋果比較是不會引起過敏的食物, 有毛的水果,像是奇異果、草莓、桃子就是比較容易過敏的。孩 子每嘗試一樣新的食物,我就會觀察他是不是有過敏的症狀,像 是起紅疹、或是會抓癢。

因為文芳的先生有過敏體質,在孩子三歲前,她十分小心謹慎地控制孩子的飲食內容及食物來源,為孩子管理風險。

除了避開過敏原,受訪者也從食品安全的角度,談到可能的健康 風險,例如彥蓉的經驗:

有一陣子不是有很多食安新聞,鮮奶、奶粉都有問題……,對大人來說,可能都會影響健康,小孩(身體)那麼小,吃進那麼多有毒的東西,會有多大的傷害……。我很注意要給小孩吃的東西,哪裡買、有沒有農藥、成分是什麼、標示有沒有清楚。

不少受訪者跟彥蓉一樣,區分孩子與大人能承擔的風險程度有異,成長中的孩子被視為較脆弱、易受傷的(MacKendrick, 2014),應該更慎重地控制與管理孩子可能面臨的風險。月青是醫師,孩子出生後,和同為醫師的先生商量,決定先轉為兼職看門診的工作型態,以便有更充裕的時間照顧小孩。她談到懷孕對自己飲食習慣的改變:

我以前對於自己吃的東西,沒那麼小心,常常覺得偶爾放縱一下,也沒有關係,工作壓力大的時候,半夜吃鹹酥雞、冰淇淋是

常有的事情。懷孕以後就不一樣了,吃東西之前,我都會先想一 想,會不會對審審不好、會不會影響審審的發展。我自己是沒什 麼關係,但影響到寶寶就不好了(笑)。

從懷孕甚至孕前,女人的身體就受到嚴格檢視與監控,懷孕的身體被 看成風險的載體與傳遞管道,她們的選擇或行為極有可能造成胎兒的 風險 (Lupton, 2011)。

延續懷孕時期的飲食管理,不少受訪者在孩子出生後,因哺乳或 為孩子準備副食品而改變原本的消費習慣,開始透過有機通路採買食 物甚至日用品。詩雅在孩子出生不久後加入「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計」,她談起入計的動機:

參加入社說明會時,他們問我動機,我很誠實地說:「因為孩子 要吃副食品了,希望給他安全的食物來源。」以前還沒有小孩的 時候,我對食物不是那麼重視,想說這樣吃這麼多年了,也沒生 什麼大病。孩子出生後,我的想法改變了,孩子還那麼小,需要 很多安全的食物來讓他長大,好像吃進一點點有害的東西,都會 對他造成影響 (笑)。好啦!我知道應該不會那麼嚴重,但我就 是想盡可能地避免。

從食材,到日常生活需要的衛生紙、洗衣精、清潔用品,詩雅幾乎都 透過「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採購。偶爾遇到臨時得補充食材, 她也會特別注意,挑選超市裡的有機蔬菜。月青從懷孕期間就開始監 管自己的飲食內容,孩子開始吃副食品後,更改變原本的消費習慣, 透過有機通路採買,她講到孩子的健康是重要的原因:

我先生和我都會開玩笑地說,大人的命好像不是命,以前我們兩個沒那麼重視吃得健康,現在因為孩子,我們好像也跟著吃得比較健康。孩子跟我們不一樣,她還在長大,吃進去的東西會影響到她的成長,甚至造成傷害,像是我們就很清楚,過多的質爾蒙,會讓孩子性器官過於早熟,在買肉類時,我都會特別小心。

這些媽媽發展出預防性消費(precaution consumption)策略(MacKendrick, 2014),透過購買與規避特定的食物,並改變生活方式,她們保護孩子免於外在威脅。

受到營養科學與相關知識普及的影響,大多數受訪者和詩雅、彥蓉、月青採取相似的消費策略,積極避免「不適當」、「不好」的食物對孩子造成危害,例如市面販售的零食與含糖飲料,除了擔心會影響正餐食慾、蛀牙、身體生長等等,她們也都提到對於大腦與心理的影響。在大學任教的靜敏,十分嚴格控制孩子的飲食,訪談過程中,她用了數十次的 junk food (垃圾食物)來形容孩子不應該吃的食物,包括乳酸飲品、巧克力、糖果等,以及幼兒園在點心時間提供的包子,她描述:「想到那些包子的顏色,不知道加了多少人工香料和色素……」佩華原本和先生一起經營公司,為了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於是增聘員工,大幅減少她的工作量。她一直認為孩子太過好動,很注意孩子吃的東西,也盡可能避免那些她認為有害小孩發展的食物,用佩華的話:「不是『真正』的食物。」她說:

那些其實都不是真正的食物,只是人工或是化學合成的添加物。 沒有小孩以前,我從來不會去看成分說明,現在仔細看過後,都 覺得很可怕,一堆不知道是什麼的成分……。曉慧(佩華的孩 子)從小就是很好動的孩子,活動量很大,停不下來,醒著的時 候就是一直說話,要她安靜,就是她睡覺的時候,我有時候很擔 心,這麼好動怎麼辦?其他孩子也都這樣嗎?……我很注意不讓 她吃巧克力、紅茶、奶茶,這些有咖啡因和含糖的飲料,擔心會 讓她更興奮、更過動。

靜敏、佩華對於孩子不應該吃的食物,有套非常嚴謹的標準,她們十 分投入監管孩子的日常飲食。不少受訪者也跟佩華一樣,很仔細地閱 讀、比較不同產品的成分,再從中選擇健康、安全的食物。她們透過 掌握孩子的飲食內容,管理會影響孩子成長的已知與未知風險。

受訪的中產階級媽媽多半擁有豐富的文化與社會資本,多數有 定期閱讀育兒知識的習慣,來源包括教養書籍、親職網站和新聞媒體 等。其中也有人藉由人際網絡取得資訊,像是參加孩子學校所舉辦的 講座、訓練課程,或是社群提供的課程,包括幼兒營養、按摩、另類 療法等等。因工作的緣故,靜敏習慣閱讀學術期刊,引用研究發現, 她強調:「過多的糖分對小孩的大腦發展不好,還會造成情緒上過度 · 亢奮。」雖然不是每個受訪者都像她一樣杳證英文期刊文章,但不少 受訪者會留意科普雜誌或媒體的轉載,作為育兒實作的指引和依據。 育有一個孩子的淑怡,在公司擔任主管,工作十分忙碌。她會利用下 班回家的時間,到特定的品牌肉舖選購小孩要吃的肉,提到考量的原 因,她說:

我之前看過一部紀錄片,在講連鎖速食用的雞肉,根本就不是 肉,那些雞打了大量的生長激素,在很不人道的環境下被強迫灌 食。我忘記在哪裡看到生長激素對小孩的影響,現在小孩吃的 肉,我都會特別去買,不敢在市場上隨便亂買。都是每週五下班 後,我會特定繞道去××肉舖買,雖然價格貴一點,但給小孩吃 比較放心,不會擔心有的沒的。

孩子就讀精靈學校的媽媽,則有幾位會參加學校或社群舉辦的講座和 課程;她們除了援用科學研究外,也會從精靈學校特有的哲學和醫學 觀,談論食物對孩子階段性發展及靈性的影響。嘉佳因一次偶然的機 會接觸到精靈學校,後來為了讓孩子就讀精靈學校,辭掉工作、舉家 遷移;她花很多時間了解學校的知識價值,也參與許多社群活動,講 到食物對孩子的重要性,她說:

有機、自然、健康,這是最基本的原則,除了這個之外,我也會考量到食物的不同屬性,以及對孩子的影響。像是,在三歲之前,我不大給他吃肉類,會過度刺激。現在我們肉也吃得很少,我自己多半吃素,家裡會避免紅肉;如果要吃葷,以白肉為主,魚或是雞肉。以前在台北時,海鮮和魚類我固定會去××(品牌連鎖專賣店)買,現在則是在主婦聯盟,有時候會在市場跟比較熟的店家買,安心還是最重要。

不同於靜敏或淑怡援用主流科學知識,作為選擇和管控孩子食物的指引,嘉佳更常引述的是精靈學校獨樹一格的兒童發展觀和飲食理論,例如三歲前要避免肉類,強烈的調味料也要少用,保護孩子的感官不受太多刺激。蕈菇類被視為菌類,不適合太早提供給孩子食用。其他孩子就讀精靈學校的媽媽,訪談時也會提到同樣的原則,儘管她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程度不同,像是文芳就不給孩子蕈菇,除了她認為

可能纖維多、不好消化外,也指出:「精靈教育認為菇類『土氣』很重,對小孩來說太過強烈。」訪談時,文芳花了很多時間解釋塊根植物和塊莖植物的差別,前者如馬鈴薯,精靈教育體系認為不適合給太小的孩子食用,後者如紅蘿蔔,則沒有禁忌。

國英的兩個孩子也就讀精靈學校,孩子出生前,她是工時長、工作繁重的會計師,成為媽媽後,她改以接案的方式兼職工作。工作與育兒之外的時間,國英參加中醫與另類醫療的研習課程,影響她對疾病與飲食的概念和想法。孩子生病時,她憑藉這幾年自修的中醫知識,先根據症狀給孩子服用中藥,盡量不看西醫是她的大原則。她說:「西藥解決的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是暫時壓抑症狀,日後常會帶來更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孩子有過敏體質,體型偏瘦,國英十分注意孩子的飲食,儘管生活忙碌,她還是堅持下廚,並強調自己煮的安全性:

我們一週平均只會有一次外食,多半是在週末的時候,可能是我們出門玩,有時候是我想休息一下。自己煮還是比較安心,我知道食材從哪裡來,也知道怎麼煮的過程……。我有幾個買菜的地方,我最喜歡週三中午在學校外面跟阿伯買,他們除了是有機外,因為當天早上才採,吃起來真的特別好吃。需要臨時補貨的時候,我會去小舖(精靈學校社群家長開的有機小店)……。像是炒菜的油,我用的是主婦聯盟的調和油,或是跟社群家長一起團購的橄欖油……。這幾年自己常煮後,有時候吃外面都會覺得怪怪的、不習慣,不是太重口味、太油,就是會擔心他們用的菜有沒有洗乾淨、用的油好不好。

精靈學校教育體系信仰的醫學觀接近中醫或另類療法,強調全人的照護,而非治癒特定疾病;這或許是為什麼除了學校舉辦的醫學或兒童照護講座外,精靈學校的媽媽們也經常自組中醫或另類療法的讀書會並參與課程。國英和其他精靈學校的媽媽們,也許不盡然遵循學校的理念和教育實作,但或多或少了解大原則,並在生活中(部分)落實。像是學校很重視孩子的飲食,選擇有機食材,供應的午餐以素食為主;家長社群間發展出團購文化,提供穩定、方便的購買管道,從生鮮蔬果、食用油、各種醬料、手作麵包點心到家庭日用品,強調的一樣是有機、安全、無毒、無污染。

受訪者認為,成長中的孩子較為脆弱,無法承受可能的傷害,相較於大人,他們的健康更加需要守護。在風險概念下,食物被區分為「好」與「不好」、「適合」與「不適合」孩子,分類的標準建立在媽媽們對於風險的認知與認識,儘管參照的科學知識來源不同。我發現這群媽媽的文化與社會資本,影響她們如何察覺潛在的威脅、判斷什麼可以被歸類為危險、進行風險的管理和排除,以及正當化風險的知識來源。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對於母親與育兒活動的預設,更促使媽媽們投入大量的勞動、心力與時間進行食物工作。她們相信藉由個人的選擇、判斷與行動,可以監管、控制和減少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各樣風險。

(二) 孩子的健康是我的責任:食物工作與母職認同

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受訪的媽媽們多半認同自己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肩負守護孩子發展與健康的責任。儘管工作忙碌, 難得有時間下廚,靜敏仍堅持自己採買食材,給幫忙她準備晚餐的媽 媽。她說從小吃母親的料理長大,很清楚自己媽媽對烹調的講究和細 心,也很放心將孩子吃飯這件重要的事,交給自己的媽媽。講到為什 麼這麼看重孩子的飲食,她說:

孩子出生就是一張白紙,基本上就是妳媽媽的責任,不能說一輩 子,這樣有點沉重,但基本上大概百分之八十,就取決於媽媽的 責任,如果妳現在很自私不理他的話,那妳將來就是自己嘗到 (後果)……。飲食塑造一個人,小孩子小時候吃什麼,也決定 了他之後的飲食習慣,這就是健康,健康很重要。

受訪者多數和靜敏一樣,認為孩子的飲食是自己身為媽媽的責任,她 們照顧的不僅是孩子的現在,更強調對未來的影響。月青回憶為孩子 進備副食品時,說道:

如何在對的時間點,給孩子對的東西,真的很重要。我是根據小 兒科 guideline,到孩子六個月大,才給她吃副食品,從最單純的 十倍粥開始,慢慢加入其他的東西,要觀察她是不是會對某些食 物過敏……。說起來有點好笑,小孩要開始吃副食品了,我才去 加入主婦聯盟,去聽入社說明會,以前只有我和先生兩個人時, 我們工作忙,晚餐都是自助餐、便當隨便吃一吃,也沒有這麼講 究,但想說要給小孩吃的東西不一樣,營養、安全都要顧到。

訪談時,月青十分強調身為母親的責任,從食材的採買、選擇、計 書,到食物的準備與烹調,每一個環節,她都小心把關。佩華的經驗 跟月青相似,她說起有孩子之後的採買習慣:

因為孩子的關係,我現在買菜會固定在幾家有機店,像是里仁、 聖德科斯……,買起來比較安心。買肉的話,則是在網路上買有 心(肉舖子)的肉,有安全認證,不用擔心亂打藥。

佩華解釋養育小孩對她的影響:

當媽媽之後,開始會看一些跟孩子有關的書,除了教養外,有的書也會講到飲食對孩子的重要性,我會擔心她會不會吃進太多不好、甚至是有毒性的食物,除了影響健康之外,也會影響其他方面的發展……。我現在就是偶爾協助我先生公司的工作,其他的時間就是在孩子、家裡,這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在外食文化盛行、選擇多樣的現在,佩華和其他許多受訪者卻以盡量 不外食為原則,藉由「在家吃飯」來管理孩子的健康風險,並實踐母 職。

書琴離開銀行的工作,現在是專職媽媽,她分享教養作家蔡穎卿 對她的影響:

我很喜歡看蔡穎卿的書,她書裡提到,孩子是看著爸媽的背影長大,我覺得很有道理,我們是什麼樣子的人,孩子也會成為什麼樣子的人,我常常提醒自己,因為小孩,我要成為更好的媽媽。她的書裡面也提到家事教育的重要,把被子折整齊、家裡打掃乾淨,大家一起動手做,營造家的感覺。吃飯這件事情也是,一家人一起坐在餐桌前,好好吃飯,聊聊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這是在向孩子表達我們的愛、關心和照顧……。我很同意

bubu(蔡穎卿)說的,要有安定的生活,孩子才會有力量。

書琴談到在小孩成長過程中,父母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雖然她分享 時提到父母或是「我們」,但從訪談中可以得知,實際上操持家務、 準備三餐、照顧孩子的是身為媽媽的她。她提到另一半的廚藝很好, 但對先生而言,做飯是休閒活動,不是生活日常。

我其實很不會煮飯,單身住在家裡的時候,煮飯的都是我媽媽。 我很少幫忙,媽媽都做好好的,我也不需要做什麼家事……。煮 飯是有小孩之後,才開始慢慢看網路、看食譜學,知道什麼菜要 跟什麼菜炒在一起,怎麼樣做才好吃。我先生不一樣,他很喜歡 煮菜,也很會煮,不過,他工作很忙,通常都是假日,或是朋 友要來家裡吃飯,他才會下廚。不過,有一點很討厭,他只喜歡 煮,不喜歡收,常常把廚房弄得很亂,我要收很久。

訪談時,書琴以「自己是專職在家」及「先生工作很忙」等理 由,理解、接受家中食物工作的分工極度不均。但僅以「有無全職工 作」並無法解釋食物工作的分工,其他受訪的媽媽,不管有沒有全職 的工作、原本是否擅長或有興趣烹飪,都是主要負責料理三餐的人, 包括採買、準備等工作。琇雅在中學教書,先生是在家接案的自由工 作者,儘管先生的工作時間較為彈性,但食物工作還是由她負責。琇 雅說:「我們好像沒有特別討論過煮飯是誰的工作,但交給他做,我 就是會覺得不放心,他沒那麼注重健康。雖然累一點,自己來,我比 較安心。」琇雅從飲食健康的考量,解釋她和伴侶之間的分工。其他 幾位有工作的媽媽和琇雅類似,以另一半「不擅長」或不像自己會在 意食材的來源及飲食攝取的內涵,合理化食物工作的性別分工。這些 看似個人選擇的語彙,掩蓋了性別作為主要的社會關係,形塑日常生 活的決定和行動的力量。

食物工作是母職實踐與母親責任展現的重要場域(DeVault, 1991)。恰如的三個孩子都在精靈學校就讀,她分享煮飯這件事情對她的意義:

學校教育很強調家庭生活對孩子的重要,穩定的節奏,不要讓孩子太晚睡,放學回到家後,開始放慢他們的節奏。上學日的時候,我們幾乎不會吃外面,六點鐘吃晚餐,收拾、洗澡、說故事、睡前儀式……,大概八點半以前,就都可以睡著。煮晚餐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節奏,好的食物,可以讓孩子的身體和心理得到充分的休息。

煮飯,不只是眾多家務工作中的一項。恰如認為,透過煮飯,也是對 孩子身心健康極為重要的生活節奏,並實踐母親的工作。

因為孩子的過敏性體質,國英實行無麩質的飲食原則,她幾乎天 天早起準備一家的早餐,外人看起來辛苦,但她這麼說:

常有朋友問我,不能吃麵包、饅頭這些小麥製品,那早餐可以吃什麼?我覺得無麩質,早餐最困難,特別是我們現在很習慣吃小麥製品。我現在有很多變化,像是前一天晚上睡覺前用電鍋煮粥,早上起來準備配粥的菜,炒個青菜、煎蛋,用前天剩下來的飯做蛋餅、飯糰、蘿蔔糕,或是用米(穀)粉煎鬆餅……,還是有很多種的選擇,慢慢孩子也習慣早餐不吃麵包、吐司。

分享無麩質飲食時,國英神情愉快,繼續講到飲食習慣改變對孩子健 康的影響:

我的兩個小孩都有過敏性體質,秋冬天氣轉換的時候,特別明顯,打噴嚏、流鼻水、鼻塞、咳嗽……,每天都會發生。我們開始不吃小麥製品後,很明顯地,他們的過敏症狀就減少了,每天早晚不會打噴嚏,流鼻水、鼻塞也比較好了,跟著晚上也睡得比較好。

國英連結日常飲食對小孩健康或成長狀況的影響,談到小孩身體狀況 改善,她驕傲地說:「看到孩子身體變好,我覺得一切(辛苦)都值 得了!」其他媽媽也經常檢視飲食習慣跟孩子的健康,像是雅雯:

小晴(雅雯的孩子)有異位性皮膚炎,常常因為癢的關係,抓到流血。我發現,只要飲食上稍不注意,她的異位性皮膚炎就會發得很嚴重,像是有次因為阿公生日,破例讓她吃了香料很多的蛋糕,結果那天晚上就慘了,一直喊很癢很癢……。有一次大發作,我們連吃了好幾天有機素,就是只吃有機蔬菜跟飯,她的症狀就退得很快。那次,吃到我自己都快受不了了……。不過,我也體會到,簡單、安全的食物,最有效,比吃什麼藥都還來得有效。

為了照顧孩子的健康,雅雯逐漸改變家庭的飲食習慣,除了採買有機 食材外,也開始減少攝取肉類,講到孩子的異位性皮膚炎已經很少發 作時,雅雯感嘆道:

要把小孩照顧好,真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想到小孩從那麼小 那麼小的時候,到現在,大家看到她現在的樣子,都很難想像她 小時候身體有那麼多狀況,我為了小孩的身體,做了很多功課、 看了很多資料,在飲食上做了很多調整,看到她現在很健康,異 位性皮膚炎也幾乎不會發作了,想起來,一點也不會覺得辛苦, 我反而覺得自己很幸運,知道這些的重要,我是個很幸運的媽 媽。

透過觀察孩子的健康改善,雅雯和國英肯認自己的用心與努力獲得正 向回饋,藉此,她們確認母職實踐的常規及其母職認同。但國英和 雅雯的經驗並不總是這麼「正面」,她們也談到要落實飲食監管的焦 慮,以及面對不確定性的擔憂,雅雯就說:

平常我們盡量減少外食,像我週二的工作通常比較多,又要到台 北的關係,趕不及回家煮晚飯。後來我請了打掃阿姨,她每週二 下午都來,幫我煮完晚餐後才離開,需要的食材,由我來買,她 負責煮就好了。每次不得不在外面吃飯時,像是出門玩,或是跟 朋友聚餐,我都會很緊張,在飯桌上要一直看著小晴,注意她有 沒有吃了不該吃的東西。

不少受訪者提到有機或食品安全的論述,如何造成她們養育、照 顧孩子時的焦慮和壓力,甚至產生自責或愧疚的心情。受訪者中,瑛 如算是相當嚴格的有機生活信仰者,不僅是飲食,從家庭清潔用品、 房子裝修時用的塗料和木材,以及孩子的穿著,她都選擇強調環保、 無毒、安全的產品。瑛如講到自己的個性原本就屬小心謹慎型,當媽 媽之後,想到可能會對孩子造成的各種影響,她就更嚴格要求自己。 訪談時,她先反問我會花多少時間洗菜,接著講述自己的經驗:

我都要花很久的時間洗菜,一根根很仔細地洗,即便買的已經是 有機蔬菜,應該沒有農藥,我還是會擔心。煮飯其實不會花我太 多的時間,洗菜最花時間,我就是會擔心。

瑛如反覆強調自己對於食物的標準與擔心——不只是食物本身的污 染,更重要的是她和其他許多受訪者口中的「對孩子的危害」。佩華 的孩子除了好動外,身高體重一直落在生長曲線的百分之三,她談到 和伴侶在熊度上的不同,以及偶爾的爭執:

我先生不像我(嚴格),他有時候會帶孩子去便利商店買養樂 多、軟糖,剛開始,我們會因為這樣子的事情吵架,我覺得他都 沒在管孩子,什麼都是孩子要求就好好好。慢慢地,我也就算 了,我不想因為這些事情跟他吵架。把老公當成豬隊友,心情上 就比較釋懷。但同時,我會要自己對小孩吃的東西,更謹慎,好 像是補救措施,補救豬隊友造成的錯誤。

佩華的經驗反映媽媽不僅是主要從事食物工作的人,也必須承擔和處 理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緒,包括面對不確定風險時的焦慮、擔心或緊 張,以及當伴侶態度不同調時,得協商雙方在教養實作上的衝突。

這些媽媽的伴侶們大多以消極的態度配合她們的食物工作,例如 減少外食、協助採買臨時需要的食材。不少爸爸會因為方便、好照顧 等理由而給孩子平時媽媽禁止的零食,詩雅語帶無奈地講述另一半給

孩子吃零食這件事:

他 (先生) 假日有些時候會帶老大去騎腳踏車或是走步道,讓我 可以在家休息。他不會主動跟我講買了哪些零食給孩子,都是孩 子很得意地跟我炫耀,爸爸買了巧克力牛奶、舒跑、出奇蛋、棒 棒糖……。剛開始的時候,我會跟我先生抱怨,要他別給小孩吃 這些東西,他會有點不愉快地埋怨,他說,這樣他比較容易帶 小孩。後來,我就算知道了,也不會戳破他,就很阿 O 地想說, 偶爾一次沒關係,不要因為他給孩子吃零食,弄得兩個人都不愉 快。

對於受訪媽媽而言,食物工作需要的不只是勞力與心力,還包括與伴 侶或其他家人溝通、協商,甚至是減少衝突、維持關係所需的情緒工 作(Daniels, 1987; Erickson, 2005),就像佩華和詩雅在權衡下選擇不 干涉伴侶的作法來避免爭吵,同時調適因原則遭破壞所帶來的焦慮和 擔憂。雖然所有的研究參與對象都是核心家庭的居住安排,但即便是 偶爾回婆家或娘家,她們仍需處理自己和公婆或原生家庭父母對於孩 子飲食原則的不同調。訪談時,琇雅講起公婆的教養方式,還是語帶 氣情:

我不是很喜歡帶佑佑(琇雅的孩子)回阿公阿嬤家,老人家為了 討孫歡心,什麼都好,除了看一整天電視之外,零食也隨便吃, 平常不可以吃的洋芋片、紅茶、糖果,阿公阿嬤什麼都可以。有 時候,我實在忍不下去,會盡量語氣溫和地提醒我公婆,但通常 沒什麼用,他們會回我,吃一點有什麼關係,或是我老公還不是 這樣吃長大的,要我不要管孩子這麼嚴。

為了避免和公婆直接衝突,琇雅誦常會忍耐以對,但回到家後,則會 跟先生抱怨不要太常回婆家,也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發洩,尋求同儕 媽媽支持。

對於大多數受訪者而言,食物工作不完全是任務導向,過程中, 她們同時重視關係性和情感的面向,如上述例子所顯示,透過情緒管 理降低衝突、維持家人間的和諧,特別是她們與孩子間的親子關係。 育有二子的真美,在老二出生後轉為兼職工作,相較於老大,老二的 體型顯得瘦小,雖然她知道孩子間無法比較,也常安慰自己孩子的發 展有一定的步調,但吃飯這件事情,還是常成為潛在的風暴,直美無 奈地說:

我常做了一桌菜,但孩子不見得捧場,特別是小的,就是很挑 食,這個不吃、那個不吃。他還不會說話的時候還好,現在會頂 嘴(台語),有時候會說:「媽媽煮的菜不好吃」,或是討價還價 說他只要再吃幾口。很多時候,煮完飯已經滿身大汗,又聽到這 些話,更加上火,都快開罵了,但只能叫自己冷静、冷静再冷 静。一旦生氣了,這頓飯就不用吃了,得好好處理。有時候,用 說道理的,像是吃菠菜會有力氣、吃魚會聰明,或是好言相勸, 用鼓勵的、稱讚的啊!

好幾位媽媽都有類似經驗,也有人會因吃飯引起衝突後,反思自己的 作法,或用文芳的話:「檢討」自己。文芳回憶餐桌上的不愉快,說 道:

他就是個很不愛吃飯的孩子,我常開玩笑說,他是吃空氣長大 的。很少能夠好好吃完一頓飯,經常吃幾口就坐不住,跑去客 廳玩,我要一直不停地叫他回來(餐桌),這樣來來回回要好幾 次。有幾次,我真的受不了了,作勢要把他的碗收走,這時候, 孩子開始大哭,喊著說他還要吃飯,我又會更加生氣,剛叫你吃 飯不好好吃,我要收走了,才又說要吃飯.....。最後,他可能又 會再多吃幾口,但那個氣氛真的很不好。

文芳談到,她常反省跟孩子的互動,檢討作法是否適切,她說急性子 的自己脾氣很不好,但因社群課程和媽媽朋友的分享,現在快生氣的 時候,她會提醒自己轉念的重要。她說:「我不想把吃飯變成一件很 不快樂的事情。」「和孩子的關係還是最重要。」這些媽媽的經驗, 凸顯傳統的「工作」定義忽略了隱形工作(invisible work)的價值 (Daniels. 1987),這些重要的情緒工作往往被視為女人的天賦本能, 或是爱的付出。

受訪者大多贊同有機飲食能降低孩子健康與發展的風險,也指出 要時時刻刻嚴格遵守信念和原則的困難。除了前述伴侶及長輩的「破 壞」外,也有人談到因工作或專職育兒疲累而「放鬆」的情況。文芳 是重度的「甜食控」,在老大三歲前,她很嚴格地控制孩子的飲食, 她說到孩子三歲之後的改變:

小宇(文芳的孩子)三歲以前,我真的很嚴格,不敢給他亂吃, 有人工添加物的,一律不行,很怕他跟我先生一樣(異位性皮膚 炎),一直控制得很好,他也沒有什麼狀況。三歲之後,我就比 較放鬆了,我自己本來就很愛吃甜的,蛋糕、巧克力啊,以前帶 他一起出門時,我都不敢吃,很怕自己吃,小孩也會吵著要。現 在我偶爾會想要犒賞自己,帶小孩真的很累,很需要放鬆。

在中學任教的金鳳,也提到因為疲累,偶爾會放寬食物工作的標準: 「我有時候下班很累,真的沒有力氣煮飯,就會去我們常去的小吃店 外食,但盡量挑選少油跟少鹽的。」文芳、金鳳和其他受訪者雖談到 信念和實作之間的不一致或矛盾,多數人仍強調有機、健康飲食是理 想的原則,只是其他的育兒責任、家務勞動或有薪工作會影響食物工 作的日常實踐。

和上世代相比,這一代母親的育兒較依賴專家權威和科學知識指 引,但這並不代表她們完全失去自主、反思和運籌帷幄的能力,淪為 科學的僕人(范代希,2017)。受訪的媽媽雖然都談到有機與健康飲 食的原則,但其實作過程往往會觀察孩子的身體反應、變化,結合不 同的食物知識。例如孩子就讀精靈學校的媽媽們,除了提到該教育體 系特有的食物觀外,不少人也結合中醫或其他另類醫療。欣霖的兩個 孩子都在精靈學校就讀,除了參加學校提供的進修課程,她和學校社 群的其他媽媽也共組讀書會,研讀中醫及無麩質飲食的相關書籍。欣 霖分享她如何根據孩子的身體狀況,調整飲食安排:

小孩吃什麼,我覺得食材來源安全、安心最重要。另外,小昀 (欣霖的孩子) 對很多食物過敏,雞蛋、牛奶、海鮮,她幾乎都 不能吃,更不要說人工添加物。(怎麼知道的?你們去驗血嗎?) 我不覺得驗血是很好的方法,觀察孩子身體的反應還是最直接的 方法,但要持續觀察,一陣一陣的,明明原本可以吃的東西,過 一陣子,可能又不行了,飲食上也要隨時重新調整。

這些媽媽的經驗敘事顯示,她們不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而是主動、 積極的行動者;她們對孩子飲食的選擇和安排,是立基於對孩子身體 的了解。此外,也有人談到自己如何意識到有機論述帶來的影響。淑 怡大學與研究所念的都是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她分享自己在育兒上的 矛盾:

我看了很多的育兒書,但看越多,好像矛盾也越來越多,有時 候,看到的是不同作者、論述之間的矛盾;有時候,是作者的想 法和自己之間的矛盾。就像有機食物這件事情,我同意有機飲食 確實對於健康有幫助,不管是孩子還是大人。也同意孩子比起大 人,他們還在發展中,如果吃進有毒物質,對他們的影響應該更 大。不過,有時候,我還是會想,這當中是不是有市場行銷的手 法?我是不是太相信這些所謂專家的說法?我自己的看法呢?還 有,我們應該都同意,這其實是件很階級的事情,不是每個家庭 都可以什麼都有機。

淑怡反思自己的食物工作,是不是太受到有機論述影響,訪談過程 中,她不時會以玩笑的口吻消遣自己太渦迷信有機,但目前還是選擇 盡可能遵循有機飲食的大原則, 她說:

我們家的經濟狀況,還負擔得起,我也覺得用在孩子身上的,不 需要吝嗇,我還是盡量會到有機商店採買,吃的肉會特別注意。 有時候,工作真的太忙,實在沒有心力,連續隨便吃個幾餐,心 裡就會覺得怪怪的,覺得自己好偷懶。

這套嚴格的飲食原則,逐漸鑲嵌於這群中產階級媽媽日常的食物工 作,儘管她們回應的方式與經驗不同,但都指出其在地經驗受到有機 論述、密集母職與風險管理等社會編派與關係交互作用的影響。

食物工作不只是簡單地滿足孩子的生理需求,更是媽媽們用來 評量母職表現(measure of motherhood)的項目,關乎她們「做媽媽」 的能力。當孩子的健康有突發狀況時,受訪者容易歸咎於自己在飲食 上的疏忽和失職,食物工作成為檢視母職實作的重要場域。這群中產 階級媽媽視自己為孩子健康的守護者,強調依循有機、安全飲食原則 的重要性。一方面從日常實作中協商、發展與肯認自我的母職認同, 另一方面也常因無法達到或依循標準而焦慮,甚至自責。

(三) 道德的消費者,道德的母親:守護孩子與環境的未來

童年社會學的相關研究指出,成人常將孩子視為或比喻為「希 望」和「未來」的象徵(James and Prout, 2015),透過保護與投資孩 子,可以降低社會集體對未來的焦慮與不確定性。所有的受訪者都提 到有機食物對孩子健康和發展的影響,除了照顧孩子的健康,也有部 分受訪者進一步提到,她們藉由每日的食物工作,協助建立孩子正確 的飲食習慣,也從中了解有機食物對於環境永續的重要性,她們守護 的是孩子的共同未來。但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有機飲食與食物倫理 的論述,強化個人責任與個人選擇的重要性(Guthman, 2008)。

除了家庭飲食習慣,孩子在精靈學校的媽媽會連結學校的午膳及 農業課程,講述培養孩子健康飲食習慣的重要,以及分辨「好食物」 與「壞食物」的能力。雅雯的孩子從幼兒園到小學都在精靈學校體 系,她談到學校營養午餐的準備原則: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學校在營養午餐上的準備真的很用心,所有 的食材來源都是有機的,魚類的選擇也會避免養殖,擔心會有用 藥。以前我小孩還在念幼兒園時,我曾到幼兒園的廚房參觀,妳 可以想像連西谷米都是有機的嗎?有機西谷米,我從來沒見過。 另外,學校在調味上也比較清淡,不會添加過多的調味料。學校 换過好多的午餐業者,很多業者都說,沒有調味,他們不知道要 怎麼煮。

她接著指出學校的午餐安排對孩子的影響:

我很支持學校的作法,保護小孩的感官,避免過度的刺激,是很 重要的,包括他們的味覺。如果小時候就吃進太多重口味的食 物,他們會失去對食物的敏銳度,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原味。妳 可以發現,吃不慣學校午餐的,多半是家庭外食次數太多,味覺 已經被破壞了。我們家很少外食,在家的飲食習慣也跟學校一 致,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飲食)教育,教小孩什麼是真正的食 物。

怡如和雅雯有相似的想法,不管是在家或是學校,透過食物工作,她 們正在傳遞給孩子健康的知識,影響他們一輩子的飲食習慣。怡如 說:「懂得吃『好』的食物,不是只對他現在有影響。小孩正在長大, 現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好的飲食習慣會影響他以後的健康。」這 些媽媽強調良好的飲食習慣對孩子未來的重要性,以管理現在的飲食 作為避免或減少不確定風險發生的策略。

除了有機、減少調味的烹調方式外,部分媽媽也提到食農教育的

重要性,包括協助孩子了解食物來源,以及建立和食物之間的連結。 碧芬是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計的資深會員,假日時,她會帶著孩子 參加合作計及其他環保團體的活動,除了吃得安心與健康外,她分享 消費習慣和教育理念:

我小時候住在鄉下,家裡附近就是農田,下課後就到田裡玩,我 們知道稻子怎麼種的、吃的米從哪裡來,現在的孩子離這些很 遠,農田越來越少,他們對於食物的知識也很少,不知道餐桌上 的食物從哪裡來……。我在主婦聯盟買東西,也想透過合作社的 理念,讓孩子知道我們吃的食物從哪裡來。

國英也談到透過食農教育培養孩子珍惜食物的觀念:

我不想要孩子對他們吃的食物,一點認識也沒有,不知道吃的 米、菜是哪裡來的。我們的米是認穀的,員山那裡的小農,除了 插秧、收割活動外,一年會有一次穀東聚會,我們會帶孩子去參 加,讓孩子知道我們吃的米是誰種的、田長什麼樣子、種田的辛 苦,這樣他們會懂得珍惜食物,珍惜我們吃的東西。

透過改變生活方式與消費習慣,碧芬和國英嘗試為孩子建立他們與食 物、土地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連結是在大規模生產方式下逐漸消 失不見的,她們認為食農教育會讓孩子懂得珍惜食物與愛護自然。

這些媽媽的敘事裡,也進一步指出人類對自然可能造成的傷害, 以及藉由個人努力可以產生的改變,就像碧芬說的:

只講求產量的大規模耕種,往往會對土地造成無法恢復的傷害, **怎麽透過有機、減少農藥、化學肥料和除草劑的種植方式,減少** 對土地的傷害……,我想跟孩子示範,要怎麼保護自然、保護大 地母親,他們長大之後,還可以再看得到農田。

碧芬相信,透過個人的消費選擇,她能實踐自己的信念與價值,並將 其傳遞給孩子,這是她守護環境與孩子的方式。訪談時,她多次強調 這是「做媽媽的責任」。嘉佳一直很關心環境議題,利用孩子上課的 時間,她參加許多自然農法的工作坊和課程,也運用所學,在自家的 院子裡種植少量蔬菜。她談到購買有機食物與友善環境間的關係:

我常想什麼樣的耕種方式,對自然、對土地的傷害最小,之前我 去樸門上課,老師有示範要把哪幾樣蔬菜雜種在一起,就可以避 開蟲害,自然就不需要農藥。或是像怎麼利用雜草做成堆肥,作 物可以長得很好,也不需要化學肥料。我覺得自然很奇妙,只有 我們人類懂得利用其中的知識……。支持有機小農,也是支持對 自然最友善的耕種方式,也許菜長得不好看一點,被蟲咬、比較 小裸,有時候小恩(嘉佳的孩子)和我一起洗菜時,我們還會發 現菜蟲、蝸牛……,我會趁機跟他說,這是因為我們買的菜都沒 有農藥,菜蟲和蝸牛都會來住。

嘉佳和碧芬一樣,重視孩子的環境教育,藉著帶孩子買菜、洗菜和準 備食物的過程,對孩子解釋什麼是有機蔬菜、為什麼農藥和化學肥料 會污染土地。嘉佳希望孩子在過程中認識他們做的事情的價值:

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都很重要,我會帶著小恩一起做垃圾分類、 用廚餘做簡單的堆肥,邊做邊告訴他,為什麼這些事情很重要、 這些事情跟保護環境有什麼關係。帶他去學校跟阿伯買菜時,我 會趁機讓他認識阿伯攤子上的菜。說真的,他現在認識的菜,應 該比我先生還多(笑)。我會跟他說為什麼阿伯改種有機作物的 故事,不只關係現在,還會影響以後,他希望長大之後還可以看 得到稻田嗎?還可以去插秧嗎?

和其他媽媽相似,嘉佳強調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安排與互動,帶著孩 子實作,一方面教導孩子守護環境的重要性,同時也守護了孩子未來 的生活。

本研究的中產階級媽媽們較少談到經濟考量限制她們選擇有機 飲食作為生活方式的實踐,反映社會階級對於個人協商、管理生活風 險能動性的影響。相較於勞工階級的媽媽,她們看似有更大的選擇自 由,但同時,性別的社會編派以及有機食物、風險管理等建制論述仍 形塑其日常實作。她們主要選擇改變消費方式,實踐對有機食物與永 續環境的信念,卻不免陷入 Cairns 等人(2013)對倫理消費(ethical consumption) 論述的評判:中產階級的消費者,特別容易將購買行 為視為改變計會與環境的管道。有機飲食的消費選擇,被視為消費倫 理的實踐,但也強化新自由主義脈絡下,個人對健康與環境的道德責 任(Guthman, 2008),同時亦間接將公共議題的解方建立於個人式的 思考和解決涂徑。

值得一提的是,小部分接受訪談的媽媽,其食物工作不僅只是改 變消費習慣、實踐在家吃飯的生活型熊,更擴展到參加農法課程、相 關讀書會、農事勞動等。例如碧芬一家和朋友的家庭共同承租、耕作

一小塊農地,她會利用週末或假期,帶著孩子實地參與農作,或如嘉 佳在自家院子實踐從農法課程學習到的知識和信念。碧芬和嘉佳的經 驗雖是少數,卻提供我們反思在倫理消費之外,實踐食物倫理(food ethics)的其他可能。她們不是如台灣主流的有機論述,只強調消費 者的健康(蔡晏霖,2014),更關照人和土地的關係。碧芬和嘉佳居 住於蔡晏霖(2016)稱為「農藝復興」最前線的宜蘭,她們和在地實 踐「友善耕作」農友社群間的連結,為其獨特的經驗提供了脈絡化的 理解。她們將母職的實踐,從保護孩子的個別健康、建立良好的飲食 和消費習慣、守護孩子的未來,擴展到友善環境和重建人與土地的關 係。

五、結論:複製性別與階級的不平等

本文探究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密集母職與風險概念如何影響特 定中產階級的媽媽們,透過有機食物的選擇、消費與烹煮,進行例行 的食物工作。研究發現有助於理解母職不只是個別的行為,更受到社 會關係與編派所形塑,包括上述的密集母職意識形態、風險論述,以 及性別分工。以食物工作為例,我闡述這些媽媽付出大量的時間、身 心勞動和情緒工作在日常的實作,但這些隱形工作(Daniels, 1987) 往往被視為女人的天職、愛的付出,未被肯認。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中產階級與有機飲食習慣為招募研究參與 對象的標準,但並未特別考量中產階級內的差異性。不過,最後研究 參與對象多落在中產階級偏中上的一端,相較於勞動階級,她們更有 資源發展和協商回應密集母職期待的策略,包括因育兒照顧退出正式 勞動市場,成為專職媽媽;婚前從事專業性工作者,因為自主性與彈 性高,可以協商轉為兼職。鮮少有人談及經濟考量限制其食物選擇與 採買。雖然言群媽媽在物質條件支持下所發展出的實作策略,無法概 推至其他社會階級母親的經驗,但研究這群媽媽的母職經驗,有助於 我們理解密集母職意識形態如何滲透日常生活,影響當代母職實作, 特別是本研究所關注的食物工作。同時,即便是擁有相對豐富經濟、 社會與文化資本的中產階級媽媽,其食物工作的實作經驗仍是複雜 的,充滿矛盾與衝突:一方面,她們從中得到情感的回饋與肯定;另 一方面,在以孩子為中心的母職論述下,她們也要面對專職育兒的疲 累、有薪工作與育兒照顧的輪班壓力、伴侶或重要他人教養態度的不 一致等等,食物工作成為衡量母職的重要標準,造成壓迫的經驗。

本研究訪談的媽媽們全數為家中食物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配偶 若有參與,僅是提供偶爾的協助,或在假日或招待朋友時,將烹飪視 為娛樂、調劑、展現才能,而非例行責任與必要工作(Roos, Prattala, and Koski, 2001; Beagan, Chapman, D'Sylva, and Bassett, 2008)。探 究家務性別分工的研究指出,影響分工的原因包括伴侶雙方的時 間(Gazso-Windle and McMullin, 2003; Lake et al., 2006)、權力關係 (Arrighi and Maume, 2000),以及性別意識形態(Bergen, 1991)。 這些研究分別從投入有薪工作時間的長短、薪資多寡和平權態度預 測家庭分工的狀況,但進一步探究分工的內涵,可以發現女性氣質 (femininity) 和男性氣質(masculinity) 仍與特定的家務工作連結, 其中女性分擔了大部分的食物工作。相關研究發現,煮飯是高度性別 化的工作,不論伴侶的工作狀態和性別意識,承擔家中主要食物工 作的還是女人(Beagan et al., 2008)。本研究的受訪者多以「比較擅 長」、「比較注重健康」等「個人選擇」的語彙合理化自己為食物工 作的主要負責人,淡化性別作為主要社會關係對於分工的影響。

食物工作不僅高度性別化,更是展現女性氣質與認同的重要場 域 (DeVault, 1991: Beagan et al., 2008: Cairns and Johnston, 2015)。受 到食品健康論述與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食物工作,特別是在家 下廚這件事情,不僅是「好媽媽」的象徵,也成為穩定家庭、守護健 康與養成有生產力公民的指標(Bowen et al., 2014)。透過食物工作 為孩子管理風險的預設與期待,不僅強化既有的性別分工,更造成母 親們為符合「好媽媽」標準,必須投入更高強度的身體與情緒工作。 當健康飲食或飲食倫理成為當代社會重要的道德論述與實踐時,社會 整體不應該只是將其簡化為個人的責任和選擇。特別是在既有的性別 體制與家庭分工下,實踐飲食倫理的責任多由女人承擔。誠如 Sarah Bowen 等人(2014)所言,我們都同意健康飲食的重要,但現實上 卻將追求健康飲食的責任轉嫁到女人身上,仰賴她們付出時間、心 力、勞力與情緒工作。

既有研究多以社會階級的分析,批判有機論述與食物工作的實作 不僅將兒童健康視為個別家庭的責任,同時強化階級不平等(Cairns et al., 2013; Harman and Cappellini, 2015)。不過,本研究少數媽媽的 經驗顯示,線性的階級批判可能簡化其母職實作,而忽略實踐食物工 作的多重意義不僅限於維護個人層次的健康,也包括重建人與土地、 自然的關係。受限於研究取樣,本文無法從食物倫理的觀點,進一步 論證食物工作、母職實作與倫理實踐之間動態、複雜的交互作用。但 本研究的發現確實提供我們反思母職的多重可能與意義,特別是從私 領域的實踐轉化為對公共議題的關照,例如友善環境及人和土地的關 係。

參考文獻

- 王儷靜、陳雯玲(2007)〈越裔新移民女性母職教育工作之研究〉,台灣女性 學學會主辦「家庭與工作:變遷現象與多元想像」研討會,高雄師範 大學,10月6、7日。
- 邱元儂(2013)《飲食革命正流行——大王菜舖子的認同實踐與文化生產》,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十論文。
- 周怡君(2012)〈從新自由主義觀點分析台灣庇護工場發展〉,《東吳社會工作 學報》, 23: 81-120。doi: 10.29734/SJSW.201206.0003
- 洪惠芬(2015)〈新世代台灣母親的處境與挑戰:就業母親在照顧與工作之 間的文化矛盾〉,《台灣社會福利學刊》, 13(1): 87-149。doi: 10.6265/ TJSW.2015.13(1)3
- 范代希(2017)〈另類科學母職與順勢療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 究》, 41: 51-104。doi: 10.6255/JWGS. 2017.41.51
- 唐文慧(2011)〈為何職業婦女決定離職?結構限制下的母職認同與實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5: 201-265。doi: 10.29816/TAROSS.201112.0006
- 徐進鈺(2014)〈新自由主義與城市治理專輯導言〉,《地理學報》,72:1-3。 doi: 10.6161/jgs.2014.72.01
- 陳毓幃(2012)《「母乳最好」?婦女餵哺母乳的建制民族誌研究》,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紫翎(2010)《全球化下在地食物網絡的實踐歷程:以台中合樸農學市集為 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應貴(2014)〈台灣人類學的未來?——新世紀的省思〉,《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94·1-50。
- 蔡晏霖(2014)〈農作為方法:「以農為本」的抵抗政治〉,《文化研究》,18:

217-226 °

-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台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2:23-74。
- 鄭忍嬌、周麗端(2013)〈一個勞動階級都市原住民女性的母職生活經驗—— 好命、認命、認命與韌命的歷程〉,《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15: 83-105。
- 潘淑滿(2005)〈台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41-91。doi:10.6255/JWGS.2005.20.41
- 盧孳艷、陳海焦(2007)〈更年期婦女之骨質疏鬆篩檢政策——風險與規訓〉, 《護理雜誌》,54(2):23-28。doi:10.6224/JN.54.2.23
- 藍佩嘉(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 27: 97-140。doi: 10.6676/TS.2014.27.97
- 蘇碩斌(2012)〈評鑑的制度化與制度的評鑑化——一個以台灣社會學者 為對象的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9:47-82。doi:10.29816/ TARQSS.201212.0002
- Arrighi, Barbara A. and David J. Maume (2000) Workplace subordination and men's avoidance of housework.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4): 464-487. doi: 10.1177/019251300021004003
- Backett-Milburn, Kathryn, Wendy Wills, Mei-Li Roberts, and Julia Lawton (2010)

 Food and family practices: Teenagers, eating and domestic life in differing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Children's Geographies*, 8(3): 303-314.
- Beagan, Brenda, Gwen E. Chapman, Andrea D'Sylva, and Raewyn B. Bassett (2008) "It's just easier for me to do it": Rationalizing the family division of foodwork. *Sociology*, 42(4): 653-671. doi: 10.1177/0038038508091621
- Beck, Ulrich (1992)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sk society: Questions of survival,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ory, Culture and*

- Society, 9(1): 97-123. doi: 10.1177/026327692009001006
- Bergen, Elizabeth (1991) The economic context of labor allo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12(2): 140-157. doi: 10.1177/019251391012002001
- Bowen, Sarah, Sinikka Elliott, and Joslyn Brenton (2014) The joy of cooking? Contexts, 13(3): 20-25. doi: 10.1177/1536504214545755
- Brenton, Joslyn (2017) The limits of intensive feeding: Maternal foodwork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9(6): 863-877. doi: 10.1111/1467-9566.12547
- Burrows, Lisette (2011) "I'm proud to be me": Health, community and schooling.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9(3): 341-352.
- Cairns, Kate, Josée Johnston, and Norah MacKendrick (2013) Feeding the "organic child": Mothering through ethical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3(2): 97-118. doi: 10.1177/1469540513480162
- Cairns, Kate and Josée Johnston (2015) Food and femininity. London: Bloomsbury.
- Charles, Nickie and Marion Kerr (1988) Women, food, and famil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opher, Karen (2012) Extensive mothering: Employed mothers' constructions of the good mother. Gender and Society, 26(1): 73-96. doi: 10.1177/0891243211427700
- Cook, Judith A. and Mary M. Fonow (1986) Knowledge and women's interests: Issu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56(1): 2-29. doi: 10.1111/j.1475-682X.1986.tb00073.x
- Coveney, John (1998) The government and ethics of health promotion: The importance of Michel Foucault.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13(3): 459-468. doi: 10.1093/her/13.3.459

- Crowley, Jocelyn E. (2014) Staying at home or working for pay? Attachment to modern mothering identities. *Sociological Spectrum*, 34(2): 114-135.
- Daniels, Arlene Kaplan (1987) Invisible work. Social Problems, 34(5): 403-415.
- DeVault, Marjorie L.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llaway, Heather and Elizabeth Paré (2008) Locating mothers: How cultural debates about stay-at-home versus working mothers define women and hom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9(4): 437-464. doi: 10.1177/0192513X07310309
- Elliott, Sinikka, Rachel Powell, and Joslyn Brenton (2015) Being a good mom: Low-income, black single mothers negotiate intensive mother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3): 351-370. doi: 10.1177/0192513X13490279
- Erickson, Rebecca J. (2005) Why emotion work matters: Sex,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337-351.
- Fonow, Mary M. and Judith A. Cook (Eds.) (1991)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azso-Windle, Amber and Julie Ann McMullin (2003) Doing domestic labour: Strategising in a gendered doma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28(3): 341-366.
- Guthman, Julie (2008) Neoliberalism and the making of food politics in California. *Geoforum*, 39(3): 1171-1183.
- Harman, Vicki and Benedetta Cappellini (2015) Mothers on display: Lunchboxes, social class and moral accountability. *Sociology*, 49(4): 764-781. doi: 10.1177/0038038514559322

- Harvey, David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nderson, Angie, Sandra Harmon, and Harmony Newman (2016) The price mothers pay, even when they are not buying it: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idealized motherhood. Sex Roles, 74(11-12): 512-526.
- Honoré, Carl (2010) Under pressure: 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hyper-parenting. London: Hachette.
- Jackson, Debra and Judy Mannix (2004) Giving voice to the burden of blame: A feminist study of mothers' experiences of mother bla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10(4): 150-158. doi: 10.1111/j.1440-172X.2004.00474.x
- James, Allison and Alan Prout (Eds.) (2015)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New York: Routledge.
- Johnston, Deirdre D. and Debra H. Swanson (2006) Constructing the "good mother":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ing ideologies by work status. Sex Roles, 54(7-8): 509-519.
- Kasperson, Jeanne and Roger E. Kasperson (2005) The social contours of risk: Publics, risk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London: Earthscan
- Katz, Cindi (2008) Childhood as spectacle: Relays of anxiety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child. Cultural Geographies, 15: 5-17. doi: 10 1177/1474474007085773

- Keane, Anne (1997) Too hard to swallow? The palatability of healthy eating advice.

 In Patricia Caplan (Ed.), *Food, health and identity* (pp. 172-19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Lake, Amelia, Robert Hyland, John Mathers, Andrew Rugg-Gunn, Charlotte Wood, and Adamson Ashley (2006) Food shopping and preparation among the 30-somethings: Whose job is it? *British Food Journal*, 108(6): 475-486.
- Lee, Ellie J. (2008) Living with risk in the age of "intensive motherhood": Maternal identity and infant feeding. *Health, Risk and Society*, 10(5): 467-477.
- Liss, Miriam, Holly H. Schiffrin, and Kathryn M. Rizzo (2013) Maternal guilt and shame: The role of self-discrepancy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8): 1112-1119.
- Lotz, Mianna (2004) Childhood obesity and the question of parental liberty.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35(2): 288-303.
- Lupton, Deborah (2011) "The best thing for the baby": Mothers'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promoting their infant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Health, Risk and Society, 13(7-8): 637-651.
- Lupton, Deborah (2013) Risk and emotion: Towards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Health, Risk and Society*, 15(8): 634-647.
- MacKendrick, Norah (2014) More work for mother: Chemical body burdens as a maternal responsibility. *Gender and Society*, 28(5): 705-728.
- Maher, JaneMaree, Suzanne Fraser, and Jan Wright (2010) Framing the mother: Childhood obesity, maternal responsibility and care.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9(3): 233-247.
- McCormack, Karen (2005) Stratified reproduction and poor women's resistance. Gender and Society, 19(5): 660-679. doi: 10.1177/0891243205278010

- Medina, Sondra and Sandy Magnuson (2009) Motherhood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7(1): 90-96.
- Petersen, Alan (1997) The new morality: Public health and personal conduct. In Clare O'Farrell (Ed.), Foucault: The legacy (pp. 698-706). Kelvin Grov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hoenix, Ann (2004) Neoliberalism and masculinity: Racializ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schooling for 11-to 14-year-olds. Youth and Society, 36(2): 227-246. doi: 10.1177/0044118X04268377
- Reich, Jennifer A. (2014) Neoliberal mothering and vaccine refusal: Imagined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privilege of choice. Gender and Society, 28(5): 679-704. doi: 10.1177/0891243214532711
- Rhee, Kyung (2008) Childhood overweigh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behaviors, parenting style, and family functioning.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5(1): 11-37. doi: 10.1177/0002716207308400
- Roberts, Dorothy E. (1997) Unshackling black motherhood. Michigan Law Review, 95(4): 938-964.
- Roos, Gun, Ritva Prattala, and Katriina Koski (2001) Men, masculinity and food: Interviews with Finnish carpenters and engineers. Appetite, 37: 47-56. doi: 10.1006/appe.2001.0409
- Rosenfeld, Alvin and Nicole Wise (2010) The over-scheduled child: Avoiding the hyper-parenting trap.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Topham, Glade L., Melanie M. Page, Laura Hubbs-Tait, and Julie M. Rutledge (2010)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erate the

- parenting style/child obesity association.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3(8): 1237-1244.
- Twigg, Julia (2004) The body, gender, and age: Feminist insights in social gerontolog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8(1): 59-73. doi: 10.1016/j.jaging.2003.09.001
- Valentine, Gill (1999) Eating in: Home,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7(3): 491-524. doi: 10.1111/1467-954X.00182
- Wills, Wendy, Kathryn Backett-Milburn, Sue Gregory, and Julia Lawton (2008) "If the food looks dodgy I dinnae eat it": Teenagers' accounts of food and eating practices in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3(1): 1-13. doi: 10.5153/sro.1681
- Wills, Wendy, Kathryn Backett-Milburn, Mei-Li Roberts, and Julia Lawton (2011)

 The framing of social class distinctions through family food and eating practic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9(4): 725-740. doi: 10.1111/j.1467-954X.2011.02035.x
- Wright, Jan, JaneMaree Maher, and Claire Tanner (2015) Social class, anxieties and mothers' foodwork.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7(3): 422-436.
- Zivkovic, Tanya, Mega Warin, Michael Davies, and Vivienne Moore (2010) In the name of the child: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childhood obe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46(4): 375-392. doi: 10.1177/1440783310384456

◎作者簡介

梁莉芳,雪城大學社會學博士,核心研究與趣為性別與(廣義的)照 顧工作,希望透過研究倡議照顧的價值與意義。近年研究涵蓋看護移 工、母職、跨國家庭與照顧倫理。目前任教於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

所,教授課程包括:質性研究方法、健康與社會不平等、性別與全球 化和性別社會學。

〈聯絡方式〉

Email: lfliang.tw@gmail.com

Raising "Unpolluted Children": The Discourse on Organic Food,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Practices of Mothering

Li-Fang Liang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Policy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Intensive mother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motherhood. In this framework it is argued that mothers are the best care-giver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y need to invest a huge amount of time, energy, and even money in raising children.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y of neo-liberalism, the society considers that individuals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well-being, health, and success or failure. Since children are regarded as uncompleted human beings, their mothers are in charge of managing their risks and preventing them from falling into danger.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influenced by the discourse of organic food, "foodwor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for mothering, and how gender and class inequalities are reproduced through foodwork.

Relying upon interviews with middle-class mother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the discourse of organic food,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ideology of intensive mothering shapes their daily practices of foodwork for their children. First, through selecting, consuming and cooking organic food, the mothers manage the risks their children confront in everyday life, and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being "polluted". Second, foodwork has become important for practicing motherhood and builds upon the identity

of "mother". Third, these mothers seek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protecting both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children's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inforce the emphasis on personal rationality in the neoliberal context. Because of their social class capital, on one hand, these mothers are more capable in making decis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practices of mothering are still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gender system. Their involvement in foodwork reinforces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division of child care

Keywords: organic food, risk management, mothering, gender, social class, foodwork